

西北史地丛书

西北民族史 与察合台汗国史研究

刘迎胜 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K281.2
L716



郑州大学 *04010851919 *

西北民族史 与察合台汗国史研究

刘迎胜 著

藏书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1281.2
716



郑州大学 *04010851919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北民族史与察合台汗国史研究 / 刘迎胜著. —北京: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12.9

(西北史地丛书)

ISBN 978-7-5078-3422-2

I. ①西… II. ①刘… III. ①蒙古族-民族历史-研究-西北地区-元代 ②突厥-民族历史-研究 IV. ①K28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187591号

西北民族史与察合台汗国史研究

著 者	刘迎胜
责任编辑	姚 兰
版式设计	国广设计室
责任校对	徐秀英
出版发行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83139469 83139489[传真])
社 址	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 (国家广电总局内) 邮编: 100866
网 址	www.chirp.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环球印刷 (北京) 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1/16
字 数	200千字
印 张	14.5
版 次	2012年9月 北京第一版
印 次	2012年9月 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78-3422-2 / K · 212
定 价	42.00元

国际广播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前　　言

我国五十六个民族中的蒙古族，是13~14世纪地跨欧亚的蒙元帝国的建立者。蒙古民族是13世纪初成吉思汗统一大漠南北各游牧部落之后形成的。在此之前，蒙古草原曾经经历了匈奴、鲜卑、铁勒、突厥、回鹘的统治。公元840年回鹘汗国败亡于辖戛斯（Qırıyız——其后裔为今柯尔克孜/吉尔吉斯人）之后，操蒙古语的民族开始崛起。在辽、金时代，大漠南北与欧亚草原（Eurasian Steppe）的游牧民族究竟如何迁移，它们之间有着什么历史联系，成吉思汗之前蒙古人及草原各部曾经经历了怎样的分化组合，成吉思汗其后裔所领导的军事远征的历史背景，这些重要问题至今尚无明确答案。

察合台汗国（Čayatai Ulus）是蒙古帝国的一部分，其建立者是元太祖成吉思汗的次子察合台（Čayatai Ulus）。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Yeke Mongol Ulus）之后，按草原传统旧制对诸弟与诸子实行分封，察合台获得阴山（今天山）北麓东起今吐鲁番盆地，西至亦烈水（今伊犁河）的草原。此后在元世祖忽必烈与其弟阿里不哥争夺帝位的战事中，通过侵夺朝廷在中亚的城郭农耕区而逐渐发展起来，与元太宗窝阔台后裔海都所领导的窝阔台汗国联合起来，与元朝进行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战争。14世纪初海都死后，察合台汗国复与元朝达成和议，双方瓜分吞并了窝阔台汗国，使察合台汗国与术赤后裔控制的金帐汗国、旭烈兀后裔建立的伊利汗国一道，并为元帝国内的三大西北宗藩之国。其极盛时代，统治了包括我国新疆哈密以西的地区、今独联体中亚、阿富汗在内的广大中亚地区。

当代学术界对元朝与西北三藩中的伊利汗国与金帐汗国研究较多，但有关察合台汗国的研究相形之下却稍觉不足，究其原因，盖因国内外研究元史与西北三藩的学者，知识结构有较大差异，分属不同的学界。关注元史的学者主要集中于中、日两国，其所依据的主要是汉、蒙文史料，而保存至今的有关察合台汗国历史文献，除汉、蒙文文献之外，还包括不少穆斯林文字史料（主要指波斯文、阿拉伯文和察合台文文献）。语言文字的障碍使得察合台

汗国的历史，除了少数专家学者外鲜为人知。

一百多年来，各国学者为整理、研究与注释上述各种文字的史料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但一位合格的史学家却不能将研究完全建立在他人翻译的基点之上，况且迄今尚有部分穆斯林史料并无任何其他通用文种的译本。由于深入钻研原始文献是史学研究的基本要求，且各文种材料之间往往互有歧异，因此察合台汗国史的研究者不但应兼通汉文与穆斯林语文，且须运用科学方法来分析对比不同史料之间的异同，这就增加了研究的困难。同时，为能充分利用前人成果，研究者还应掌握几种主要的欧洲文字和日文、察合台汗国的著作。应该说，察合台汗国研究作为一门兼及元史、突厥史、蒙古史、中亚史的专题，在中国史领域属难度较大的课题之一。

本研究以前述成吉思汗时代以前的蒙古与欧亚草原及早期的察合台汗国为题，力图通过对每一个案的深入分析，在中国史、突厥/蒙古学与伊斯兰学等多学科的基础上，重新构思与解说 11~14 世纪北方游牧民族的历史。

刘迎胜

2011 年 10 月 27 日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第一章 蒙古人的早期历史	1
一 蒙古的族源	1
二 三十姓达旦、九姓达旦及其他	6
三 骨利干和拔野古	9
四 尼鲁温蒙古与迭列列斤蒙古	12
第二章 蒙古西征历史背景新探	27
一 马卫集书所记民族迁移运动研究	27
二 Kimek 部中的达旦人	36
三 伯岳吾氏问题的提起	38
四 伯岳吾氏与 Yemek 部	42
五 钦察玉理伯里部和康里部中的伯岳吾氏	48
六 历史上北方民族的西迁潮流	56
第三章 蒙古在中亚统治的建立与察合台汗国的发展	67
一 察合台在蒙古国中的地位	67

二	察合台的大臣	73
三	朝廷与西北诸王矛盾的由来	78
四	西北诸王反抗朝廷始于拔都	81
五	术赤后裔诸王势力在中亚的增长	86
六	有关阿里不哥的几点再探讨	88
七	海都叛乱原因考	93
八	阿鲁忽称汗	95
九	阿鲁忽降忽必烈	99

第四章	海都、都哇与元廷的战争	119
一	忽必烈统治势力的西伸	119
二	八刺归国即位与斡端城之得失	122
三	忽必烈、八刺与海都	126
四	忽阐河之战	128
五	朝廷势力在西域的发展	132
六	至元初年的畏兀儿之地	134
七	都哇围火州之战及其影响	137
八	曲先塔林都元帅府与北庭都元帅府	145
九	阔里吉思被俘与铁坚古山之战	149

第五章	察合台汗国与西北历史地理研究	166
一	肯切克（Kenjek）城	166
二	中唐到元初曲先地区的历史	170
三	古代中原与西域之间的玉石之路	173
四	塔里木河潜流重源为黄河说的产生	175
五	徙多河是塔里木河吗	177
六	托勒密《地理志》中的塔里木河	185

七 “塔林”的意义及元政府在曲先塔林的活动	188
八 关于失必儿与亦必儿族源的讨论	191
九 失必儿、亦必儿的地望	195
十 成吉思汗时代的亦必儿和失必儿	198
十一 乌马里书中的失必儿、亦必儿	201
十二 玉哇失在亦必儿、失必儿的战事及其背景	203

蒙古语族语系蒙古语族的起源

蒙古人在13世纪崛起，建立了雄霸欧亚的大帝国。成为草原民族，其主要分布地区在蒙古高原及周围地带。蒙古本土相对较为贫瘠，但草原上水草丰美，地势平坦，气候干燥，适宜游牧生活。蒙古帝国的建立，推动了蒙古语的传播。蒙古语广泛分布于蒙古高原游牧民族。蒙古语是上层社会的官方语言，对蒙古族人来说，蒙古语和本民族的其他族群语言起着重要作用。蒙古语是蒙古族的母语，在蒙古语族的初期就占据着最重要的地位，是蒙古族人的重要交际工具。

蒙古语学研究，是蒙古语的起源、历史演变计划做出的第二支蒙古语系研究的蒙古语学理论观。这两个不同的问题，蒙古语学的研究之下探讨，是两个不同的问题，而且两者都是一个整体的一部分。几乎包括了蒙古语学的所有问题，是蒙古语学研究的主要内容。

蒙古语学研究的出发点，首先就是蒙古语族的起源。早期学者的研究，最初是从蒙古语系的分支——突厥、契丹、女真、蒙古、满洲等民族的起源入手的。通过这些民族的起源，进而推导出蒙古语族的起源。这种研究方法，是错误的。蒙古语族的起源，是蒙古语族内部的民族，如契丹、女真、蒙古、满洲等民族的共同起源。

蒙古语学研究要从蒙古语族的起源，即蒙古语族的各成员的来源。尽管如此，中国“五胡乱华”、“胡乱华”、“胡乱华”等名称的使用，都肯定地把“胡”（即蒙古语族）的成员归为“华”，即汉族。学者们把“胡乱华”或“胡乱华”归为“胡乱华”，即汉族。

第一章 蒙古人的早期历史

一 蒙古的族源

蒙古人在 13 世纪崛起，建立了地跨欧亚的大帝国，成吉思汗死后，其帝位继承人的直接统治地域逐渐限于蒙古本土和汉地，在蒙古国领土西部，形成了四大汗国：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和窝阔台汗国以及伊利汗国。后来窝阔台汗国灭亡，其领土大部分为察合台汗国吞并。蒙古帝国的崛起，震动了欧、亚、非三洲。13~14 世纪在世界历史上被称为蒙古时代。14 世纪下半叶以后，蒙古民族及其后裔继续在亚洲和东欧历史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欲知蒙古人是如何从一些弱小的、分散的和默默无闻的部落发展起来的，就不能不注意蒙古人的早期历史。

蒙古民族（即广义的蒙古人）的起源，与成吉思汗所源出的那一支蒙古人（即狭义的蒙古人）的起源，是两个不同的问题。蒙古民族的起源这个课题，是研究操蒙古语的各部落产生、发展的历史，其中包括了成吉思汗所出部落的历史。而“狭义的蒙古人”的起源这个课题，主要是研究从唐代蒙兀室韦到成吉思汗先祖时代蒙古部的历史。

谈论蒙古民族的历史，首先涉及蒙古民族的族源。根据学者的研究，蒙古的族源是东胡→鲜卑→室韦→达旦、蒙古。东胡是与匈奴大约同时见于史乘的民族集团。战国时期，东胡常与燕国征战，燕国筑长城以拒之。这道长城从造阳（今河北宣化）修到襄平（今辽宁辽阳）。公元前 3 世纪末，匈奴征服了东胡，把他们划归左贤王统治。

东胡是中原华夏人对今内蒙古东部族属相近或相同的各部落的总称。服虔说，东胡“在匈奴东，故曰东胡”，^①这说明“东胡”并不是这个部落集团的自称。近代曾有些西方学者把东胡说成是“通古斯”的译音，这无根据的

臆断，现在几乎已无人相信了。从昭乌达松漠到额尔古纳河流域，是以东胡人及其后裔（鲜卑、契丹、室韦、达旦）为主体的，语言风俗相近的各个部落的居地。这里可称为东胡及其后裔历史民族区。把这一历史民族区的各个主要民族共同体，当做一系列有历史继承关系的对象来把握，并以此线索来从事研究，是从日本学者白鸟库吉开始的。他在《东胡民族考》这篇长文中，把东胡、乌桓、鲜卑、宇文、吐谷浑、乞伏、秃发、拓跋、地豆于、霍、室韦、羯、柔然、奚和契丹等衔接起来，当做前后继承的古蒙古人来考察。他在另一篇著作《室韦考》中，又指出室韦、达旦、阻卜都是对蒙古人的称呼。^②白鸟氏的这些意见对研究蒙古族的族源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他受自己制造的匈奴—蒙古说的束缚，把“匈奴别部”羯人也列入东胡系统，产生明显的漏洞。至于白鸟库吉对语言资料的处理，充斥着任意性，科学价值不大。^③

自19世纪以来，有些语言学者把突厥、蒙古、满—通古斯语归入一个更大的语言集团——“阿尔泰语系”。后来又有学者把朝鲜语也划入此语系。当今还有另外一些学者反对“阿尔泰语系”的理论。由于这一研究超出本书的论述范围，故略之。此处暂采取“阿尔泰语系”说。

东胡人的语言属于古老的阿尔泰语系。根据文献记载，鲜卑人和室韦人、契丹人的语言有一脉相承的关系。现今保留下来的有关东胡人的语言资料虽然为数不多，仍可使我们对东胡后裔的语言作大体判断。应该说，东胡后裔各族的语言，自成一个古老的语言体系，经历了已经无法确知的多次分化和融合过程。它曾有过鲜卑、拓跋、契丹、室韦等许多语言和方言，但大都绝灭了。现代蒙古语族各语言，只是从其中一两种语言、方言发展而来。如果把东胡后裔诸部的语言系统比作一棵古树，那么可以说，其树干和许多枝梢已陆续枯死，只余下个别树枝，移植在新的土地上，又长出新的树干和枝梢，形成了现代蒙古语族。

东胡人就是乌桓（丸）人和鲜卑人。服虔说：“东胡，乌丸之先，后为鲜卑。”《三国志》云：“乌丸、鲜卑即古所谓东胡也。”王沈的《魏书》亦曰：“乌桓者，古东胡也”；“鲜卑者，东胡之余种也。”^④这些记载都说明了东胡与乌桓、鲜卑之间有毋庸置疑的关系。据《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记载，东胡的一支居于鲜卑山，因地得名。2世纪中叶，鲜卑乘匈奴衰败占据了蒙古高原，“南抄缘边，北拒丁零，东却夫余，西击乌孙”，强盛一时。五胡十六国

时期，许多鲜卑人进入内地，建立割据政权。后来拓跋鲜卑统一黄河流域，建立了北魏王朝。拓跋鲜卑南迁后，曾派人在其先人居地“旧墟石室”刻石纪念。据文献记载，“旧墟石室”在乌洛侯部之北。1980年，我国考古学者在今内蒙古鄂伦春旗西北发现了这个石室及北魏时代祭祀祖先的刻石铭文。这个石室离蒙古部的祖先唐代蒙兀室韦居地今额尔古纳河不远。这从地望上证实了拓跋鲜卑与蒙古人祖先之间的密切关系。

《隋书·经籍志》称“又后魏初定中原，军容号令，皆以夷语。后染华俗，多不能通，故录其本言，相传教习，谓之‘国语’”。从这段记载看来，北魏时“录其本言”，也即记录鲜卑语用的是汉字。《经籍志》著录了13种鲜卑语书籍，计有：《国语》15卷、《国语》10卷、《国语物名》4卷（后魏侯伏侯可悉陵撰）、《国语真歌》10卷、《国语杂物名》3卷（侯伏侯可悉陵撰）、《国语十八传》1卷、《国语御歌》11卷、《国语号令》4卷、《国语杂文》15卷、《鲜卑号令》1卷（周武帝撰）及《杂号令》1卷，^⑤惜今悉已不存；但仍有几个有明确释义的鲜卑语词汇，借其他汉籍而保存下来。唐代地理书《元和郡县志》中关内道云中县（今山西大同）项下记曰：“纥真山，县东三十里。虏语纥真，汉言三十里。”云中是拓跋鲜卑人4世纪时就已占据的地盘，所以这里提到的“虏语”只能是拓跋鲜卑语。许多研究者已注意到，“纥真”明显地与蒙古语基数词 ghuchin “30”相同。另外《南齐书·魏虏传》记下了十三个表明身份、官职的拓跋鲜卑语名词，一律带有蒙古语式的后缀“真”：

国中呼内左右为直真，外左右为乌矮真，曹局文书为比德真，檐衣人为朴大真，带仗人为胡洛真，通事人为乞万真，守门人为可薄真，伪台乘驿贱人为拂竹真，诸州乘驿人为咸真，杀人者为契害真，为主出受辞人为折溃真，贵人作食人为附真，三公贵人通谓之羊真。^⑥

在《元朝秘史》中，表明蒙古语身份、官职的后缀是-chi，而-chin 是-chi 的复数，意为“……者”。所以按元代蒙古语法解释，这十三个官称表示的都是复数。但我们下面还要提到鲜卑语阿干（兄）和蒙古语阿合（兄）之间同样只相差一个尾鼻音-n，使人相信，“真”（-chin）在六朝时代还是单数意义。^⑦这十三个官职中有几个保存在13世纪的蒙古语中，例如，“曹局文书”的

“比德真”，即必阇赤（bitekchi），书记者；“通事人”“乞万真”，即怯里马赤（kelemechi），译臣；“守门人”“可薄真”，即 khapakhchi，门人；“诸州乘驿人”“咸真”即站赤（jamchi）；为“贵人作食”的“附真”，即保兀儿赤（ba'urchi）等。这十三个名词中有一些的词干可复原为突厥语，这说明拓跋鲜卑语中有相当多的突厥语借词，这应与拓跋鲜卑吸收了大量的操突厥语的人口有关。但后缀“真”对判别拓跋鲜卑语的族属有决定意义，因为它表示一种语言的词法特征，说明拓跋鲜卑使用的是一种与蒙古语有着共同祖先，并且有密切近亲关系的语言。

慕容部和吐谷浑部都源于鲜卑人的另一支——东部鲜卑，而吐谷浑部是从慕容部分化出来的。据《旧唐书》卷 198 列传 148《西戎·吐谷浑传》记载，“其先居于徒河之清山”（今辽宁义县境），西晋永嘉年开始西迁。《宋书》卷 96《鲜卑吐谷浑传》记西迁时，吐谷浑与其弟若洛廆^⑧的使臣乙那楼之间的一段对话，提到了一句鲜卑语“处可寒”，并注明“虏言‘处可寒’，宋言尔官家也”。由此可知，慕容鲜卑语“处”，犹言你；而“可寒”即后世之可汗，原意为官家。

伯希和认为，这里的“处”，表示蒙古语之 ci（你）或满语之 si。^⑨白鸟库吉则认为“处”为应答叹词，并比作《元朝秘史》的“者”（zhe，旁译那般者，应声）。亦邻真以为，“处”作蒙古语 zhe 十分牵强，鲜卑人的语言未必与后来的蒙古语近似到连叹词都是一样的程度；况且这类词并不能用来作判断语言关系的根据。^⑩吐谷浑西迁后，若洛廆追思其兄，“作‘阿干之歌’。鲜卑语呼兄为‘阿干’”。学者们从“阿干”（兄）与蒙古语“阿合”（兄）的比较中，推测这两种语言有同源关系。而阿干的-n 尾音，应当说反映了更古老的词法形式。实际上，元代一些蒙古语名词仍然保留着-n 尾音，例如兀孙（usun），水；答刺孙（dara sun），酒。但今天这些词汇的-n 尾音已脱落，上述两词已分别变成 us（水）和 dars（酒）。亦邻真猜测，在蒙古人的直系祖先所使用的语言中，阿合这个词在六朝时代可能也曾有尾音-n。^⑪伯希和还注意到，《宋书·鲜卑吐谷浑传》云“‘莫贺’，宋言父也”。伯希和推测，“莫贺”应与蒙古语“阿八哈（abaqa）”相当，“犹言诸父”。^⑫他还注意到，吐谷浑诸可汗中，有两位可汗的名字以“豆”结尾，他提出此或为蒙语形容词接尾-tu 之译音。^⑬

综上所述历史地理和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研究，使人相信，鲜卑人应是蒙

古族的直系或旁系远祖。

室韦是鲜卑的后裔。说蒙古的族源可上溯至室韦，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室韦人都是蒙古人的直系祖先，也不一定凡是称为室韦的就必定族属相同。但可以肯定，室韦人的主要部分，使用的是东胡后裔诸语言。室韦初见于《魏书》，北魏时分布于契丹之北，靺鞨之西。对于鲜卑和室韦的族称，伯希和提出：“鲜卑所表示的原名，与后译之室韦所本者相同，似为 Serbi, Sirbi 或 Sirvi 等。汉代用以-n 收声的阳声字译写他族语言中含尾辅音-r 的音节，后来改用具有齿音尾声之字。”^⑪

据此，“鲜”字以收-n 声，似转写 ser 音节。汉代这种译例很多，如汉文史书称波斯 Arsak 王朝为“安息”，其都城 Part 则译为“番兜”。汉以后还有这种译例：摩尼教教主摩尼之母 Marayam，在汉文摩尼教经典中作“满艳”。伯希和所谓具有齿音尾声之字，指室韦之“室”。室在《广韵》中属质韵部，以-et 收声（齿音）。隋、唐时用以-t 收声的入声字，转写他族语言以-r 结尾的音节的例子很多。^⑫伯希和根据汉至魏晋时代，汉语音译他族文字中以-r 收声的音节时，择字变化的规律，推测鲜卑和室韦是同一族名 Serbi 在不同时代的音译。如果伯氏的意见能够成立，那么造成 Serbi 一名两译的原因可能是，已经汉化的拓跋魏贵族不允许当时仍留居今呼伦贝尔一带的，与自己有近亲关系的原始部落与自己使用同一个族名，而用“室韦”来称呼他们。拓跋魏甚至不愿承认慕容、段氏这些地道的东部鲜卑是鲜卑人，而称之为“徒何”和“白部”，^⑬就是一个证据。

与室韦大致同时见诸于史籍的契丹也是鲜卑的一支。《隋书·北狄传》与《北史·室韦传》都说，室韦盖“契丹之类，其南者为契丹，在北者号室韦”。《魏书·失韦传》和《北史·室韦传》还说室韦的语言同于契丹。现代学者的研究揭示了契丹语与古蒙古语之间的密切关系，证明契丹语属于蒙古语族；^⑭但是契丹人不是蒙古人的祖先，他们只是蒙古人的近亲。

隋、唐时代，室韦分布西至俱轮泊。唐人所记室韦的资料中，提到了一个“蒙兀室韦”，这是蒙古的名字首次见于史籍。《旧唐书·北狄传》记道：“今室韦最西北与回鹘接界者，乌素固部落，当俱轮泊之西南。”看来这里说的是回鹘汗国（745~840）时的情况；但在写到蒙兀室韦时，史文又说：

大室韦部落，其部落傍望建河居。其河源出突厥东北界俱轮泊，屈曲东流，经西室韦界，又东经大室韦界，又东经蒙兀室韦之北。^⑨这里提到“突厥东北界”，又表明这里用的是745年后突厥汗国灭亡以前的材料。望建河，《新唐书》卷219作室建河，室字当讹。望建河即今额尔古纳河，为黑龙江上源支流。^⑩

今海拉尔河西流至新巴尔虎旗阿巴该图附近折向东北，称额尔古纳河。在洪汛期，额尔古纳河水向呼伦湖（俱轮泊）倒灌，河湖相通，且俱轮泊又在望建河上游方向，所以唐人记望建河源出俱轮泊。^⑪从两《唐书》的记载可以看出，在突厥、回鹘统治漠北时期，蒙兀室韦还居于额尔古纳河（望建河）流域，他们进入蒙古高原，应当是840年回鹘汗国崩溃以后的事。南宋初，洪皓在《松漠纪闻》中已明确指出蒙兀室韦与后来蒙古的关系，他说“盲骨子，《契丹事迹》谓之朦骨国”，“即唐蒙兀部”。室韦人在隋、唐时隔俱轮泊与突厥为邻，并受其治，突厥设3吐屯总领其部。成吉思汗诸先祖中有名篾年土敦者。土敦即“吐屯”，篾年土敦的名字中包含有突厥语官号。

二 三十姓达旦、九姓达旦及其他

达旦大致与蒙兀室韦同时见于史籍文献。正如突厥这个名称最初是阿史那及其近亲家族所出部落的名字，后来成为操突厥语民族的总称一样，达旦起初也只是一个部落的称号。虽然在不同时代的非蒙文史料中曾有过三十姓达旦、九姓达旦、白达达、草头达靼、黑鞑、蒙鞑等部落或部落集团，但这些部落本身都有自己的历史，并不自混于达旦。在辽金时代，蒙古部之东有一个强大的部落集团名塔塔儿（Tatar），真正的达旦指的是他们。

当达旦的名称最初在唐玄宗开元二十年（732）所立的阙特勤碑中出现时，已作为泛指名词使用，也就是说，所指的已不完全是，或不一定只是后来的塔塔儿部。达旦何时从一个部落的名称，变成泛指名称，现已不得而知。该碑铭在言及阙特勤死后，前来送葬的列邦来宾时，提到汉人、吐蕃人、柔

然人 (Apar)、弗林人 (Apurum)、黠戛斯人、三姓骨利干人、三十姓达旦人 (Otuz Tatar)、契丹人、奚 (Tababi) 等。铭文在列数后突厥汗国的敌人时，又云：

南边桃花石（按，指唐）本吾仇敌，北方 Baz 可汗及九姓乌护本吾仇敌，黠戛斯、骨利干、三十姓达旦 (Otuz Tatar)、契丹及奚 (Tatabi)，皆向来敌视吾人者也。^⑯

三十姓达旦在此碑文中与吐蕃、九姓乌护、契丹等并提，说明它已十分强大，足以与后突厥汗国相抗衡。阙特勤碑文举出的这些民族，从黠戛斯开始，大致由西北向东南顺序排列。位于骨利干和契丹之间的是三十姓达旦，亦邻真教授认为，这里三十姓达旦的地理位置大致相当于汉籍中记载的室韦人所占据的空间。我想这里反映出的三十姓达旦的居地，应大体上相当于蒙古高原的东部。

在突厥文碑铭中还出现了九姓达旦的名称。据《毗伽可汗碑》铭文，唐开元初年九姓乌护 (Toquz Oghuz) 曾联合九姓达旦抗击后突厥汗国；而据《磨延啜碑》铭文，回纥葛勒可汗（磨延啜）即位之初（747 年即位），九姓达旦和八姓乌护共同抗击回纥，战于色楞格河等地。749 年，达旦人进攻回纥失败，一半民众投降回纥。次年葛勒可汗又东征达旦。足见这时达旦已是漠北强大的游牧集团。

达旦的名字也大致在这一时期出现于汉文史料。贾耽的《边州入四夷道里》中述受降城至回鹘衙帐道里时，提到一个达旦泊：

中受降城正北如东八十里有呼延谷，谷南口有呼延栅，谷北口有归唐栅，车道也，入回鹘使所经。又五百里至鵝泉，又十里入碛……又西北经密粟山、达旦泊、野马泊、可汗泉、横岭、绵泉、镜泊，七百里至回鹘衙帐。

贾耽提到的这个位于回鹘衙帐东南数百里的达旦泊与九姓达旦的关系，可由王延德的记载证实。王延德提到在合罗川（即元之哈刺和林川）唐回鹘公主所居地之南，有“九族达靼之尤尊者”“达干于越王子族”。^⑰如果这里的九族

达靼就是突厥文毗伽可汗碑铭中的九姓达旦的话，那么达旦泊应该就在这个达干于越王子族居地附近一带。

840 年回鹘汗国土崩瓦解后，达旦作为漠北强部一再出现于汉籍。唐李德裕《会昌一品集》卷 5 有《赐回鹘温没斯特勒（勤）等诏书》，其末云：“卿及部下诸官并左相阿波兀等部落、黑车子、达怛等，平安好。”^⑪王国维把黑车子和达怛点断，但亦有学者持不同意见。^⑫会昌二年（842），黠戛斯使臣踏布合祖至唐天德军云：“纥纥斯（黠戛斯）即移就合罗川，居回鹘旧国，兼以得安西、北廷、达怛等五部落。”^⑬这里的达怛应当就是上文中与黑车子并提的达怛。五部落中可能包括了黑车子。黑车子在《会昌一品集》中多次被提及，仅一处与达旦并提，所以我想王国维把它与达旦点断是正确的。

综上所述，在唐代突厥文、汉文史料中，已出现了三十姓达旦、九姓达旦和达旦等名称。以后，达旦这个名称的使用范围又进一步扩大，甚至在和阗塞语文献中也出现其名称。^⑭我们可以设想，或许在某一个历史时期，蒙古高原东部诸部中塔塔儿人最强，臣服了许多邻近操蒙古语的部落，所以突厥人和回鹘人泛称他们的东邻为达旦。在这些臣属于达旦的部落中，估计有不少室韦人，所以“室韦”与“达旦”这两个称呼有时混用。《辽史》卷 29《天祚纪》提到一个部落“阴山室韦”，这个部落在《史愿亡辽录》中则被称为“阴山鞑靼”。^⑮这是表明 11 世纪时，室韦和达旦两个名称有时互相混用的例子之一。但这种混用并不普遍，不能作为通例看待。据《旧五代史·外国传》记载，唐光启（885~887）中，契丹贵族钦德“乘中原多故，北边无备，遂蚕食诸部”。被他役使的既有达靼，也有室韦。这说明达靼和室韦的概念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在汉族史家头脑中是并存的。所以达靼并不是突厥人对汉人称为室韦的那一部分人的称呼。

波斯史书《史集》曾这样解释众多的突厥、蒙古部落被称为达旦的原因：

塔塔儿人的“名称自古以来即闻名于世。从他们产生出许多分支”，“在远古的大部分时间内，就 [已经] 是大部分 [蒙古] 部落和地区的征服者和统治者。由于 [他们的] 极其伟大和受尊敬的地位，其他突厥部落，尽管种类和名称各不相同，也逐渐以他们的名称为人所知，全部被称为塔塔儿。这些各种不同的部落，都认为自己的伟大和尊贵，就在

于跻身于他们之列，以他们的名字闻知于世”。^②

这段记载证明了我们上面关于为什么北方许多游牧部落被泛称为达旦的假设的合理性。

12世纪时，塔塔儿人的居地在俱轮泊一带，但是唐代操蒙古语的游牧部落——其中许多戴着达旦名号——已活动于突厥、回鹘人的地域大漠南北。除了九姓达旦之外，辽金时代的扎刺亦儿部，是“阻卜”中的大部。波斯史家拉施都丁在叙述这个部落的历史时说：

人们常说，自古以来（qadima）他们的营地在哈刺和林。他们是那样地赤胆忠心，以至于一直把油脂供奉给畏兀儿的君主古儿汗的公驼群。^②

这里所说的无疑是回纥漠北汗国时期的情况。“古儿汗”可能是扎刺亦儿人对回纥可汗的称呼。这段记载证明8~9世纪，扎刺亦儿部的居地已在回纥汗廷附近，受制于回纥贵族。王延德亦提到回纥人役使达旦部落之事：“传曰契丹旧为回纥牧羊，达靼旧为回纥牧牛。回纥徙甘州，契丹、达靼遂各争长攻战。”我想，扎刺亦儿等操蒙古语诸部，也许就包括在这些受回纥役使的达旦部落中。

总而言之，这些带有“达旦”名号的操蒙古语的游牧部落早已活动于蒙古高原的东部和中部，与操突厥语诸部发生了密切的联系；而成吉思汗所源出的蒙兀室韦——蒙古近亲集团则不在其列。他们在金代被称为“黑鞑”，迁居蒙古高原是回鹘汗国灭亡以后的事。

三 骨利干和拔野古

除上述被称为达旦的部落之外，骨利干和拔野古也是与蒙古人有密切关系的部族。骨利干，多数学者已认为它就是10世纪以后生活在黠戛斯以东的昂可刺河（今安加拉河）流域的操蒙古语的豁里部落（Qori）。“骨利干”与“豁里”所表示的应该是同一个名称，但目前还没有学者能满意地解释“骨利